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文革·清华·人性	黄瑞和
【亡灵祭坛】	7·27前夕不幸遇难的同学与实验员	陆忠楠
【往事非烟】	我经历的沙甸战斗	佚名
【史海钩沉】	毛泽东是如何找到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	大海之声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劫后反思】

文革·清华·人性

· 黄瑞和 ·

◇ 开篇

1966年六月初，笔者还在北京北部的延庆县参加“四清”，毫不知晓当时的清华园以及全北京已经翻了天。我们奉命草草结束工作，撤回学校，才发现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已经“开了锅”。

笔者自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当研究生，都是属于“政治觉悟低”、“思想后进”的学生之列。不仅中学时未加入共青团，到了清华后，在班上也是从后面数的。好不容易三年级时被同学又拉又推入了团，此后就再没什么长进。因此，虽然已贵为研究生，“四清”时在延庆刘斌堡大队第四生产队，还是给一位女大学生当了下手。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除了努力学习，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外，从未有过其他的想法。

在刘斌堡的九个月，我对农民生活之苦有了直接的体会。那里的农民在地里劳累了一年，除了分得一些小米（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和红薯之外，别无他物。由于各家分得的小米不多，一般都不吃小米焖饭，而是吃“捞小米饭”。就是把小米放在开水里煮几分钟，没有完全熟就捞起来，放到盆里压压紧，就成了饭。由于小米未熟，吃起来很粗，不消化，吃不多，但比较耐饿。煮小米的水还要留下来喂猪。那里不种油料作物，很少有食油。自养的猪由于没有粮食喂养，一般比较小。小猪养大后，农民自己不能宰杀，都要卖给国家，所以一年到头很少见到饭桌上有肉吃。过年前，生产队杀猪要经上面批准，这样农民才能有一点猪肉过年。我们工作队员每天到一户农民家（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家除外）吃派饭，按规定交给他们饭钱和粮票。对农民来说，钱和粮票是个宝，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国营粮站去买点面粉。我们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粥和小米捞饭，偶尔能吃一顿红薯小米焖饭或者用黄粘小米（当地称为黄米）做的饼子，那算是大大改善了。每户有一点自留地，种点蔬菜，如大白菜、瓜豆之类，数量很少。平时吃的就是自家腌制的酸白菜和咸菜。春天菜荒，大家只得

到刚开冻的地里去挖野菜，如蒲公英的幼苗。农民每年的收入就靠生产队卖给国家的公粮、余粮得到的一点钱，按照各户积累的“工分”进行分配；再加上卖猪、卖鸡蛋给国家后的一点钱，来买点布、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延庆的冬天很冷，农民烧炕用的是生产队分下来的玉米杆，那哪够呢？因此每到入冬，年青男子都要到山里去砍柴，当地人叫“卧柴”，一去好几天，带上驴子、干粮、铺盖，吃住在山里，然后将打好的柴让驴子背回来。我没跟他们一起进山砍过柴，但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是即使是这般困苦的生活，上面还要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搞副业，更不让开工厂。大队原先有一个小厂，用山里的一种灌木枝杆做成农民抽烟用的烟杆，我们叫它杆厂。当地没有其他小工业，杆厂多少能给大队赚点钱。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就要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主办杆厂的大队长作为四清运动的批判对象。

延庆四清的经历，对农民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也很想为农民做点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命运。1968年下半年毕业分配前，我曾写信给系里管分配的干部，希望能到刘斌堡大队当农民。可见当时我在政治上是如何的无知与幼稚。分配小组自然没有理睬我，我被分配到江西省南昌市报到，那已是后话了。

回到学校，我被裹挟到文革运动中去。六月下旬，工化系“临革筹”分部准备召开一个批判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全系大会，要研究生班派人发言。滕藤在清华是个典型的“又红又专”、“双肩挑”干部：他是校党委常委，又是工化系分党委书记兼副系主任，还给高年级上专业课，又带研究生。滕在文革初期力保蒋南翔，却深感大厦将倾、无力回天，最出名的一句话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当时是研究生班的小弟弟，才上了一年课，搞了一年四清；其他同学大多是三、四年级的，比我知道得多。讨论结果，大家决定批判滕藤的“反动学术权威”。记不得哪位同学提出了“28学时”的题目，说滕藤在留苏期间曾修过一门课，只上了28个学时，回清华后就开了这门课，可见他不学无术。其实这个“28学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读，那就是他悟性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所以这种“批判”如同其他无数的文革“批判”言论一样都是经不起深究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

稿子写好了，要派一个人上台发言。班上党员不少，出身好的也有，但不知咋的，阴差阳错，我被推选去发言。本人一贯很怯场，最怕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但那时不知怎的勇气上来，也就答应了。在全系大会上，这个“28学时”的简短发言居然博得了轰动性的效果，成为批判大会的一个亮点；我也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革“生涯”。

工化系研究生班在文革中是比较活跃的，最初以“工化研”署名。在批判工作组时写了“叶林，给你上点纲就够你呛”的大字报。在反王光美时又画了一组“三打白骨精”漫画，在校内外颇有影响。那时我们很忙，搞来一部手摇油印机，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一下印发几百份传单。“工化研”后来改名为“不怕鬼”战斗组，在团派、四一四派分裂时，“不怕鬼”也分为两拨，分别在两派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笔者后来参加了唐伟等人发起的“八八串联会”，之后又加入了“天安门纵队”，最后加入四一四派，参加了该派早期的重要活动，并主持“四一四广播台”的工作。武斗开始后我淡出运动，但仍留在校内；最初在科学馆，后来转到东区主楼，在电机系馆三楼的一间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实验室的窗户正对着随时会有冷枪打来的9003大楼，晚上不敢开灯，一直到7月27日工宣队入校结束了武斗。

◇ 文革，人治社会的顶峰

文革期间，我们这些“红卫兵”造反派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领会”（实际上是猜测）、如何紧跟“中央领导精神”。所以除了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的文章、社论逐字逐句进行研究之外，就是收集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小道消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都奉为圣旨。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中央首长”自身也不可靠了；今天还在给群众大讲文化革命的大道理，明天就可能变为阶下囚。文革初期，陶铸一下子从广东省、中南局上升为中央首长，代表中央到处讲话，但很快被打倒了，一下子销声匿迹；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一度红得发紫，却一下子变成了“小爬虫”；杨成武也一度大红大紫，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杨余傅反党集团的成员；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理论权威陈伯达，也同样没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综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戴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像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遗风一直沿袭至今——虽然不可能再有毛当年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人治的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现在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平民百姓负责。因此官场上就出现了斥责记者“你是在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官员。许多干部还是戴着一副假面具，以正人君子的面孔，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官话。但是，他们的面具一旦被扯下，人们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伙腐败透顶的肮脏货色。正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官员都戴着假面具，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也很难听到他们的真心话，故而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谣言”、小道消息在网上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更激起了民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如何改变沿袭至今的干部制度，将各级干部的假面具扯下来，将他们的言行举止放在阳光底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在言论开放、新闻自由的社会，被选举者不可能有假面具，也不需要假面具；同样的，他们的背后也不会再有一只操控的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需要对其负责的是那些握有选票的选民。这才是“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形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迈开第一步。

#### ◇ 清华文革的缺失

对清华文革的反思，除了要对文革期间在清华园内发生的事件做出客观的、以事实为依据的调查、分析之外，还要将这段历史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and 思考。

“清华文革历史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对，也不全对。清华文革中有红卫兵运动，有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有保守派，有造反派，有造反派分裂以致武斗，打死人，又有工宣队进校并掌权等等，这些都与全国文革相似。但是，据笔者了解，在整个清华文革历史中，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学生、教师、干部等，包括笔者本人）有过对整个文革以及导致文革发生的中共专制体系进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团派和四一四派都赞同文革，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闹革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分歧。与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对文革及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以及广州“李一哲”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呼吁相比，清华园内一份有

分量的文章也没有。即使自我感觉良好的周泉纓，他所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也没有跳出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华文革史上的这一缺失，是中共在清华实行的教育方针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清华有过辉煌，造就了许多大师、思想家。但1949年之后，通过多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斗争，将一大批思想活跃，精神自由，敢抒己见的优秀知识分子戴上了“右派”的“紧箍咒”，有的甚至被关了起来，这样就彻底肃整了清华的教师、干部队伍。再加上有清华特色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把人类固有的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不同思维方式，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党性”模子中，使人人都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阶级路线为纲的招生方针，将出身不好、调皮捣蛋、思路出格的学生关在门外，对收进来的学生进行清华整套教育制度的整合，把他们原有的一点棱角也给磨平了，使之根本不会“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直译：在盒子外想问题）跳出框框思考问题。所以文革之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也不会跳出毛泽东的手掌。

正因为清华教育体制的这一特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带有了这个印记。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人们津津乐道地炫耀有多少清华人当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少人当上了部长等等。但是这些“贵人”都没能走出“维（持）现（状委员）会”的圆圈，最多当个“维现会”会长而已。

笔者认为，清华文革史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阶段实际上是从1966年夏到1968年末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后，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完全控制了清华，那场半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就完结了。在校学生大部分“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此后几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回顾和反思当年的文革运动。笔者在离校之后逐渐接触社会，同时与昔日的“战友”保持联络，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对我而言，最深刻的“政治启蒙”莫过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纪要”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揭露和批判，真是句句击中了要害，唤醒人们去思索，去质疑。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文革的真实面目以及毛的政治图谋。

据笔者所知，对文革及中共制度有真正反思的清华人，最有代表的是罗征启和W先生。罗征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革后出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态度明确，即使罢官仍坚持不屈。W先生曾任“四通”总裁，1989年学运中支持学生，六四之后被迫流亡法国。九十年代初来美访问期间，曾到笔者所在的大学演讲，近年还时常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他们真正体现了传统清华人的风骨与良知。

对清华而言，若要重新铸造历史上的辉煌，必须摒弃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辅导员制度”等方针，重新提倡清华原有的“精神自由”的学术民主风气；同时摒弃几十年来实行的“清华人执掌清华”这种人才内循环的潜规则，打开大门，礼贤天下，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 ◇ 文革与人性

文革初期引用最多的毛语录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无法无天”的“伟大领袖”这些语录的煽动下，人类本性中丑恶的那一面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文革中一些最为恐怖、最无人性的行为：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带、木棍抽打自己的同学、老师、校长，甚至将其致死；一群“贫下中农”将一些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统统杀死，从肉体上消灭；众多家庭中夫妻互相揭发批判，儿子批斗老子，甚至大打出手，将其肋骨踹断。这些违反人类道德乃至基本伦理的行为，都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还冠之名为“红色风暴”。

即使在“精英”聚集的“最高学府”清华，文革初期也发生过由一些高干子弟操纵的“清华红卫兵”，联合了2000多名中学红卫兵，开进清华园，推倒二校门，将大批教授、干部抓来，运砖搬石，随意抽打，甚至把他们关进阶梯教室毒打的824“红色恐怖”事件。此后，随着造反派分裂，殴打、绑架事端迭起，甚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团派一些极端分子在八达岭三堡私设监狱，随意绑架学生、干部，将他们投入“监狱”；甚至绑架与清华毫不相干的罗征启的弟弟，令他窒息而死；团派枪手从9003大楼对刚从外地返校，路经主楼广场的女学生钱平华瞄准射击，开枪致死。一直到7月27日那天，当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时，竟然遭到一些极端分子的疯狂抵抗，几百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后人怎能想到，这些泯灭人性的罪恶行径，当年就曾发生在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之中。

该如何从社会学、心理学方面来看待文革中发生的人性变异的现象呢？笔者对此有一些浅见。

关于人性可以有许多的观点，许多的争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之争。笔者认为，两者都有道理，两种现象都有存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由于天性（天生即具有的）以及后天的环境、教育因素等影响，一种人生性善良，不愿或不忍加害他人；另一种人生性凶残、好斗，为了某个目的，不惜加害别人甚至致死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无论是过去的封建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由于社会道德、法律纪律的约束，人类本性中丑恶的一面往往不容易显现出来，很少会有大规模的、普遍的残忍事件发生。但是，一旦出现了譬如文革这样毫无道德伦理、毫无法律约束、无法无天、疯狂躁动的特殊时期，人类本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肆意宣泄，于是就会发生现在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最残忍、最无人性的暴行。

人的善良的本性，造就了历史上一批圣人，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而人的凶恶的本性，也造出了残忍的暴君、杀人犯。古代中国的秦始皇，近代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二战战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前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等。毛泽东从不隐讳对秦始皇的好感，自比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为了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他高举“三面红旗”，不惜饿死几千万农民。为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大同”，消灭资本主义，他可以让几亿中国人以死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和权力，他对几乎所有与他一起战斗，共同建立了共和国的党内外合作者施加迫害，令他们倒的倒，死的死，一点怜悯都没有。毛比其他暴君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要在人的灵魂、人的意识方面摧毁敌手，让他们恐惧，不敢说话，让他们被迫说假话；为了生存而去“告密”、揭发、出卖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最后达到他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统天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柬共就是在毛和中共的教唆和支持下，短短两三年里就消灭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许多社会精英，造出了世界前所未有的白骨山。生性残忍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最多也就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如一些连环杀人犯。但如果是一个国家首脑，一个掌管了国家和军队大权的人，那就是人类

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死去，人类的历史就有可能倒退。因此，越有权力，越有地位，就越要头脑清醒，越要有人性，越不要轻言战争，这才是正道。

毛泽东一贯以“阶级性”来反对“人性论”，似乎只要是“先进阶级”，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就可以不受人类共同的人性与道德准则的束缚，甚至杀人放火都有道理。正是这种思维，这种教育，造就了文革期间一批高喊革命口号，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青年学生，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实际上，不管什么阶级，其中都有善人，也有恶人。这与阶级无关。历代皇帝中，既有欺压百姓的暴君，也有施行仁政的明君。农民起义者中，也不乏有一些杀人如麻的魔王。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产生过专制独裁的领袖，所谓“没落”的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一批施福于他人的善者，如盖茨（Gates）、巴菲特（Buffett）这样的巨富，正在将他们积累的财富造福于全人类。

回过头来思考清华的文革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剧情是围绕着团派和四一四派的争斗，所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实际上也绕不过对这两派争斗的思考。

以笔者所见，团派与四一四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激进与温和的区别，实质上是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需要继续革命的立场的对立。具体表现在观点上，团派主张“彻底砸烂”，“大翻个”，而四一四派主张“红线主导”，主张解放占大多数的好干部。笔者与沈如槐合写的大字报“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及“什么彻底砸烂”，就是两篇代表作。本来出现观点上的分歧，或不同的主张，这在群众运动中是十分正常的，可以通过辩论、争论，求同存异。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辨环境却被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所践踏，最终导致了武斗的发生。

历史已经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清华武斗是由谁挑起的。武斗的发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致使人性中的仇恨、暴烈因素被极大地浓缩、激化起来，驱使各方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违反理性与良知的举动。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反思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人性的本质，往往在一些重大事变面前会表露得淋漓尽致。

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对待727工宣队进校的态度上面。当天，两派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着几万名工人开进清华园的客观事实。当时笔者仍在校内，对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由衷欢迎，如释重负，觉得这下子真的能停止武斗了。四一四派完全没有反抗，主动放下武器，接受工宣队的管制。与此相反，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却拼命反抗，开枪投弹，打死打伤了几百个工人。蒯大富还到毛那里去告状，要抓黑手，可见他们是多么不愿意放下武器，多么不愿意停止武斗。联想到他们在武斗之前犯下的种种暴行，人性的善恶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人性论的另一方面是人类个性的多样性。由于各种原因，如先天的基因遗传，后天的人生经历，环境，教育等造成了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有的性善，有的性恶；有的倾向激进，有的倾向保守；有的喜欢冒险，有的安于现状；有的顽固坚持己见，有的善于折衷求和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是在人类共同的道德、法律的范围內做事，都是应当允许的，都不应受到歧视或者排斥。在当今许多国家中，左、中、右，激进、保守、顽固、折衷都大有人在，相安无事，而且他们都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不像在中国，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上存在着一股“恐右症”：“宁左勿右”，“左”总是好的，“右”总是坏的。这种状况应当予以彻底改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中国当代民主先驱曾经抨击那些吹嘘党和国家如何团结，如何一致，人大、政协、党代会如何“完全赞成”，“一致通过”那种橡皮图章式的投票选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在在一个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尚且会有争吵，会有不同的看法，到了一个国家，那么多人，那么多个性，那么多倾向，那么多不同的利益，居然会对任何一件事情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岂非咄咄怪事。看看国外的例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革命推翻并处死之前，还是以100%选票再次当选。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是以100%当选。这些在刺刀底下投票的结果不是很快就变成了历史的笑话吗？

文革中的清华，学校党委、各级组织全部瘫痪，没有人告诉你做什么，要选什么，也没有人给你的档案里写东西。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思想来行动，做选择。这段特殊时期的个人行为与选择，是一个极好的研究人性样本的场合。团派、四一四派分裂之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当然大多数人选择当了“逍遥派”，不再参与运动。真正参与的是少数人，每派也就一两千人，积极参与的则更少。记得1967年4月15日四一四派冲击校广播台，笔者拿着准备广播的四一四文告，与同伴们冲了进去，为的是要发出被团派压制良久的不同声音。行动失败后，我们聚集在明斋大门外示威。后来队伍开往主楼广场，一路上居然有一两千人陆续加入，最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在主楼广场发布了四一四派宣言。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极好例子。

人是社会动物。每一个人都要为他/她自己在社会上做的事情负责。文革是一场最荒唐，最无人性的事件。人们可以将历史的责任推到文革发起者毛泽东和他的同伙身上，可以推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上，但是这并不能解除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就拿钱平华这件事来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她开枪，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独自走在主楼广场上；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个枪手开的枪？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个曾在柏林墙东德一侧守卫的士兵被审判。这个士兵枪杀了一位企图翻墙投奔西德的东德青年。法官在给这个士兵判刑时，驳斥了那种把责任推到上级命令的辩护。他说即使你是奉命开枪而不得不开枪的话，你也可以而且应该把枪口向上提高一厘米！杀害钱平华的枪手以及下令指使他开枪的人都是罪人，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

在对文革以及历史上多次的极左路线指导下的“运动”进行研究和分析时，“恐右症”及与之并存的“左总是好的，至少它的出发点（动机）是好的”这种思维一直存在。在一些人看来，诸如“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革命”的。而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即使其后果是千百万人生命的丧失，国家经济倒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管其后果如何，也是邪恶的。所以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口号。农民在文革后自发进行“联产到户”的自救行动，即使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却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鞭挞。至于“文革”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也因为毛出于革命的目的，毛要进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新阶段，所以其中也有合理的一面，可以理解，可以原谅。难道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搞的以“革命”的名义实行的大屠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斯大林以“纯洁革命队伍”而进行的疯狂的大清洗，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这种“左总比右好”的思维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自己曾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现在是把毛的话用在毛本人身上的时候了。

凡是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经济倒退的，无论是以什么口号进行的，都是对人类的犯罪，都应当受到谴责，都应该受到彻底的清算。

## ◇ 红卫兵运动与农民起义

在团派与四一四派分裂之后，由工化研究生班刘云清主笔，以“不怕鬼”的名义写了一份大字报，张贴在二教楼前的大字报栏。此文将红卫兵运动与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时这份大字报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历代的农民起义，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有的失败了，有的胜利了。即使是胜利了，其结果只是朝代更换，“你下台，我上台”。几十年到几百年后，一个朝代被推翻，另一个新朝代又开始。皇帝、朝代更换了，但制度没有改变。如此反复，历经两千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遵循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就是要将权力回归民众。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的道路。美国自革命驱逐英殖民者后建国几百年，其基础就是民权。在一部宪法的管辖下，各级政府、议会都是民选的。民选的总统、议员等统统对选民负责。这个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虽然在这几百年中，美国社会经历过许许多多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各阶级、政府、党派等方面的抗争、较量、妥协，逐步得到解决。即使在现在，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矛盾还大量存在，但这个解决矛盾的机制一直在持续地运作着，没有发生制度的变革。究其根源，因为这个国家是民众自己的国家，民众是主人，不需要换个“主人”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看到的。所以他们预言资本主义社会会因为阶级斗争而走向衰亡，共产主义会取而代之的结论是荒谬的。近些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很严重，有的国家如希腊社会矛盾激化、动荡，但也没有引起革命，没有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其制度有着自身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被后来的蒋介石改变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体制。及至毛泽东和中共上台，更将其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如历代农民起义建立新的朝代一样，论功行赏、分封官爵。不管什么人，革命有功者都分到大小不等的官职，到社会各部门、学校、机关、以至文艺团体去当“领导”。毛泽东更为之正名为“外行领导内行”。

毛泽东在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他就不高兴。这正说出了毛和中共政权的本质，实际上仍然是中国历朝历代更换时“你下台，我上台”历史的延续。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围绕着一个“权”字，公然声称造反派要眼中盯着权，心里想着权；他的如意美梦就是第一步在清华夺权，当上清华第一把手，然后再当上中央委员，逐步向上爬。可是他的南柯美梦被四一四派搅黄了，所以他气急败坏，不惜挑起了武斗，企图用武力来达到掌权的目的。

文革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由皇帝发动的造反；不是反对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对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资派”官僚。当红卫兵造反派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皇上不再需要他们，就一反掌地把他们打了下去，最后也没有上台。因为这个台还是皇上和他的亲信占着呢。

中共政权这个“打天下，坐天下”的实质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又得到了证实。共产党打下的江山不能丢失，所以要用机关枪、坦克来保卫。



1989年的民主运动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难得的从“打天下、坐天下”到民主法制社会转变的机会。可是当时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并没有民主的素质。他没有像蒋经国那样从一个专制者到一个结束专制、走向民主伟人的转变，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之后几十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普遍的越演越烈的官场贪污腐败，形成了庞大的权贵集团，使得历史的转变更加困难。

毛泽东的中共政权与历代皇帝的朝代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把皇帝的江山换成一党的江山，换为党内众多头目及其子女后代的江山。平民百姓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资产，一切都归所谓的“国家”，实际上是党所有。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经济发展时期，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用“国家”所有的土地为资本发了横财，中饱私囊；而另一方面众多平民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生存权益而拼死抗争的悲剧。

1989年民运及六四镇压之后，有不少人评论“学运领袖”们的表现，认为这些“学运领袖”比共产党的干部好不了多少，也许更糟；如果这些“领袖”上了台，中国可能更糟糕。这些评论的出发点还是那种“你上台，我下台”的思维，以为民运的宗旨就是“你下台，我上台”。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89民运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力图以民主来取代专制。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的塑像就是一个象征。中国近代的民主力量有过几次抗争。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就有过不少要求民主的言论，如反对“党天下”的一党专制等，后来被毛的反右完全镇压下去。百万右派，其中不乏有民族精英被打入了另类。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民众以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和其后台毛泽东，又被镇压了。1978年到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早期为邓小平的复出出了力，后来却被邓小平打下去。1989年的民运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最高潮，当时几百万人口的北京竟然有百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贪官。只要看看“人民日报”这个一贯是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喉舌，居然也有大批的记者、编辑打着大标语上街游行的情景，以及人民日报当时排版及内容的改变，就会感到这股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

如果89年民运没有被镇压，但其后果是一些人上台，一些人下台，整个制度没有改变，那会是更大的失败。

如果我们对当年的“民运领袖”逐个分析，他们之中也许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也难怪。他们当年只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如果他们上台，不见得会比当时的领导者好多少。但是，这场伟大运动的宗旨不是简单的“你下台，我上台”，而是要思考制度的变革，要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新道路。

上面提到的那份关于红卫兵与农民起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没有可能指出如何走出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反复循环怪圈的新途径，这是历史的限制，也是我们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笔者来美国之后，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知道的历史资料，才进一步看清了国内几十年来隐瞒历史，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文过饰非的真面目。另一方面，通过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观察与体会，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遵守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走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融入世界文明，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 结束语

文革十年，在“破四旧”、“彻底砸烂”等口号下，无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无数家庭被抄砸，大量文物被毁坏，许多文化人士被迫害，中华民族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瑰宝遭到了空前的洗劫。

世界历史上有过多次文化破坏事件：由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去破坏、摧毁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宗教的文化。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会自己去摧毁自己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除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政权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没有走到摧毁自己文化的地步。斯大林的暴政虽然凶残，也没有砸烂俄国的文化遗产。

清华文革，旷日十年，是一场有两万多师生员工参与的运动，是清华百年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章。对于文革历史，尤其是清华文革的历史研究，包括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清华人的一份历史责任。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方法，来进行梳理和分析，为后人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总结和教训。

但是遗憾的是，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仍是一个禁区。不仅无数的文革历史资料被封锁，许多研究结果、当事人的回忆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一无所知，许多当事人已凋零离世，即使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步入老年。这种禁锢、封锁是对历史的继续犯罪。所幸的是，在世界各地还有一大批学者在从事文革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香港、台湾等地还能自由出版关于文革的书籍、杂志。

笔者谨在此向对本文作过宝贵指点的多位朋友致谢。

2013年8月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作者简介：黄瑞和，1940年生，广东台山人。1958年入清华工化系核化学专业。1964年毕业转研究生。〕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亡灵祭坛】

### 7·27前夕不幸遇难的同学与实验员

• 陆忠楠 •

本文作者于1968年7月9日，在主楼九楼西端目睹414的据点科学馆的顶层遭团派某些人投掷燃烧弹而化为灰烬。又于1968年7月27日上午十时许，在主楼三楼目睹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救护车开道，从东便门进入母校，清华两派百日武斗宣告结束。在这之间的半个月中，有数个鲜活的生命被枪杀！他们没有等到脱离险境的那一天。四十五年之后的今天，特作回忆文章，以纪念两位与我们永别的同学与实验员。

#### 第一篇 钱平华同学遭枪杀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城闲地少，水巷小桥多”。钱平华同学（自802班）家住苏州城内西善长巷，周围环境幽静，人文底蕴丰厚。她有苏州才女的潜质与素养，乃不得已而读工科，亦照样学习成绩拔尖，人品素质出众，举止行为大方。她说话带苏州腔，软

绵绵的，养耳。她耐得住寂寞，骨子里头总有一股子劲。1968年5月初，她满可以利用千载难逢的假期，回到苏州城内老家，过上一段诗情画意的安稳日子，与家人共叙天伦之乐。而她选择留在学校主楼替老四做具体事情。

自八年级同学150余人，老四占绝大多数，1968年5月初选择留下来的仅有钱平华与我两人。真是奇迹。我们同属主楼第三梯队，分工不同，平时见面机会不多。那时我在想，自八年级惟有我们两人留下来这一事件的随机概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此小概率的事件得以出现，说明彼此之间存在特定的共同之处。现在看来，这种共同之处非常难得。她本是值得我崇拜，去追求的女生，可惜当年缺乏勇气而错失良机。而我的错失良机又使得她失去机会。她一旦接受我的追求，在我（一个做事有点仔细的人）的叮咛下，有望时刻注意自我保护。为此，我永远后悔当年缺乏勇气。

1968年6月底，钱平华同学正忙着，收到了母亲身体不适的电报。她急匆匆赶回苏州，发现母亲仅是牵挂女儿所致。陪伴母亲约两周之后，钱平华辞别母亲回京。她来到设在市府门前的老四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明确告诉她，主楼前广场已被9003大楼老团枪支封锁，无法从学校东便门进入西主楼。她当晚住胡贵云同学家。第二天，或许她一时未能理解枪支封锁的真正含义；或许她坚信一个文弱的女生不会遭到枪支攻击；或许她急于回到主楼内相处已有时日而难舍难分的老四伙伴那里；或许这难舍难分的老四伙伴中间，有一位与她情投意合的老四男生；或许她今天要给自己情投意合的老四男生一个惊喜。钱平华同学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于7月18日中午，风采动人地进入学校东便门，经过主楼前广场时不幸被9003大楼老团枪支打中。

那时我在焊接馆北门口吃午饭。见自控系老四负责人但燊呼着我的名字大声说“你们年级钱平华中弹了！”“在哪儿呢？”我受惊而问。“主楼前广场”。我赶忙奔跑至西主楼一、二区之间的过街楼底下（属安全地带），见主楼前广场空无一人。旁边老四同学说，钱平华已用吉普车送北医三院抢救。

傍晚，噩耗传来，钱平华同学经抢救无效而逝世。

当晚，老四总部记者就钱平华同学的生平事迹采访了我，并写成悼念文章。半夜零点，老四广播台（主楼）播放哀乐之后，播出了关于钱平华同学逝世的讣告以及悼念钱平华同学的文章。

据后来消息，抢救时，钱平华曾醒过来一回，说“听到两声枪响，第二声以后就不知道了”。

八饭厅一位穿军装的大师傅说，当时他骑着自行车也经过主楼前广场，第一声枪响后，他拼着命往前骑，听见弹头噓噓声。

如果钱平华同学听到第一声枪响之后，立即奔跑的话，定可幸免于难。

7月约20日，我跟五、六位老四同学一起来到北医三院太平间。当时无冷藏装置。翻开存放钱平华同学遗体的长方形木箱，见遗体上下铺盖着冰块。除去上面冰块，小心揭开遗体双臂的衣物，左上臂进、右上臂出的弹痕清晰可见，近似圆形，比赤豆略大。随行的老四摄影记者站在木箱两侧侧板上，拍遗体照多张。

9月约20日，毕业分配结果已宣布，自802班班长吴兆远交给我两个镜框，一是由光学实验室放大的钱平华同学遗像；二是别在红布上的二十余个像章。托我带到上海，择日送到钱平华同学苏州家里。

1968年10月2日，我携带两个镜框来到苏州城内西善长巷，钱平华同学家里。钱母号啕大哭，摸着女儿的遗像，不停地喊着“心肝！心肝！妈等你分配呀！”。一会儿，钱父劝说“不要哭了，听这位同学说说”。

我永远后悔当年缺乏勇气。

## 第二篇 杨树立实验员遭枪杀

1968年7月初，有老四同学由东往西，通过动农馆门口东南一侧桥梁时，被老团步枪打中，弹头穿过腿部，鲜血直流。据说未造成重伤。步枪枪眼在二校门西侧对面房屋的一段弯墙上。老四总部为此出了布告“主楼通往动农馆的道路与桥梁已被枪支封锁，……”。

7月5日，为取回由动农馆借老四广播台（主楼）的一只99型动圈低阻话筒（俗称‘手榴弹话筒’，质优，紧缺），我得去一次动农馆。傍晚时分，我从主楼出发，为求安全，沿着往西方向道路的北侧人行道边缘走，到了上述被封锁桥梁的东端，则奔跑过桥面。而奔跑至桥梁西端时，听到砰一声步枪响。随后，动农馆的边门嘎一声开了。“打着吗？打着吗？”一个年纪稍长于同学的男人出门急切地问。“好像没打着，没什么难过感觉。”我回答。“枪声一响，就知道有人来了”男人显得很老到地说。这位男人就是动农馆32岁的实验员杨树立。他迎我进了动农馆。

说明来意，我取到了话筒。随后，杨树立带着我到楼上楼下参观了一下。天色已晚，见守卫在动农馆的同学多为女生，一个个坐在蚊帐里休息，多数陌生。所认识的汪姓女同学也不见身影。动农馆内一片静寂。杨树立对我说，你今晚不要回主楼了，明天有一辆土坦克（在履带式牵引车上用钢板围焊成装甲，可能称土装甲车更贴切）送菜而来，你坐土坦克回主楼。我想了想，若不回主楼，别人会以为我被老团抓走了，而且我对第二代加厚钢板的土坦克同样无好感。便推辞说，这里有蚊子，我住在主楼七楼没有蚊子，我得回去。杨树立实验员亦不勉强。外面夜色黑乎乎，下着小雨。他给了一件深色的工作服，套在我白衬衫外面，作掩护。告别以后，我出门一口气奔过了上述被封锁的桥梁，沿着道路北侧人行道边缘，往东跑到了主楼。

翌日（7月6日）11点许，见一辆土坦克停在西主楼一区北侧道路旁。约半个小时之前，乘坐土坦克的杨树立实验员中弹之后，已用小面包车送往医院抢救。后传来噩耗，杨树立实验员经抢救无效而逝世。

他昨晚还让我今天乘这辆送菜之后的土坦克回主楼，没想到今天，他自己遇难于这辆送菜之后回主楼的土坦克。

这是老团第一次使用穿甲弹。弹头穿过土坦克的加厚钢板之后，动能骤减，斜着射进杨树立实验员的肩膀之后，据说刺入脊椎，剥夺了他的生命。

此后，土坦克弃用。

杨树立实验员的继母闻讯赶到学校。

（作者简介：陆忠楠，1944年生，自803班。1968年9月毕业分配。）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往事非烟】

### 我经历的沙甸战斗

· 佚名 ·

四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事，像一部电影一幕幕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由黑白慢慢的变成彩色。岁月的脚步虽在不停的走着，转瞬即逝，但四十年前那场战斗的回忆却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也是永恒的。

“沙甸事件”给沙甸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是文革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由于文革对宗教信仰的破坏，沙甸一些人被极端势力利用，造成大量的汉族、回族等无辜群众死亡，是特殊情况下的历史悲剧。

1975年7月下旬，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同意，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调动了126团、119团二营和120团二营、昆明军区集训的4个侦察连，总字122部队9大队12个连队等部队。由昆明军区和14军组成前线指挥部，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刘春山任总指挥，统一协调，指挥各参战部队。126团担任主攻，并执行穿插分割任务，拿下三个要点，并抓头头。中央首长指示：执行任务的部队，就是平叛部队。126团那时执行甲种步兵师编制，每个步兵连有四个排，三个步兵排加一个炮排；一个营有五个连，三个步兵连加一个机枪连和一个八二无后座力炮连。那时我刚满20岁新兵，服役于126团二营部无线通讯班，使用的装备就是884电台，也就是常见的步谈机。

7月29日凌晨3时，由我团一名副团长带领一个加强排突入村内核心地域，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团部所在地，执行抓他们头头的任务，我营六连为先头连，从村前小石桥向前推进。这时四周还是一片宁静，但突然被阵阵急促的钟声响起而打破。瞬间，枪声大作，对空射击的流光弹，照亮了夜空。六连前进到街口，遭遇街面交叉火力和屋顶火力的猛烈扫射，立即倒下一片，也牺牲几个。这时耳机中传来副团长急迫的呼救声：“我们已被包围，请求支援。”团长命令他们：“就地坚持抵抗，援兵很快就到。”过了不到20分钟，耳机里传来一声巨响，后来就再也听见副团长的呼叫。一个加强排几十人就这样没了。后来见着他们的遗体，都被炸得烧焦了而面目全非。

天亮后，经激烈的战斗，我们突进了街区，上午，我们在一个院落待命，离我们约10多米的地方，传来一声爆炸，随后看见一个战士血肉模糊出来，原来是一营一个八二无后座力炮班正装填炮弹准备发射，却被投来的一颗手榴弹引爆，一个班10多名战士当场血肉横飞，院子里这里一颗头颅，那里一截残肢，这儿一块肉，那儿一条腿，没有一人是全尸。后来用一副担架将10多名战友的残缺肢体装上抬走。由于伤亡极大，又不熟悉地形。对街战、巷战、院落战等复杂战术又缺乏训练。指挥部对战斗方案进行了调整。下午，部署近百门迫击炮、加农炮在鸡街糖厂的一个小高地上，随时准备炮击。

要炮击了，部队从村庄里向外撤离，那场景如洪水溃堤，人挤人、踩踏着来不及运走的尸骸而慌不择路，甚至夺路而奔。到了安全区，背靠塹壕，仰望天空，空中密集的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落入距我们3—5百米的村庄，炮击过后，立即突入村内，进行搜索前进，战友们因见过了太多的血腥，变得十分警惕，面对房门，一脚踢开，侧身就是一阵扫射，其实在经过炮击后的屋内已没有了人。

当夜，撤回小河对岸，晚上10时许，河对岸甘蔗林有些响动，不知谁开了一枪后，全线轻重武器一起开火，猛烈而密集射击，持续了数小时，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问话：“发生了什么事？谁下令开火？”各级指挥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开火命令。疯了，整个战场都疯了。由于白天目睹了太多的尸骸和血与残肢，精神高度集中疲惫至极，又饿又累又恐惧（因指挥部的意图是，凌晨3点形成包围，3小时即天亮前结束战斗，然后返回蒙自吃早饭，所以后勤保障全部留在蒙自）。此时的我也在疯了状态，身体靠在土坡边，猛烈的射击还未停止，但我已听不到枪声，似睡非醒开始说一些莫明其妙的胡话，并大喊大叫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语言，精神错乱了。持续10多分钟，清醒了，枪声还在继续，但已没有以前那么激烈，原来很多战友的枪管已被打红膨胀，弹头就在前方几米掉下，只能等枪管冷却。天亮后，到甘蔗林去看，原来打死了几头在甘蔗林乱穿的牛儿。

随后几天，伤亡减少了，每天老一套，撤退、炮击、进村收索，步步为营，步步推进，晚上也不撤回，就在村内就近找一个地方住下。记得一天晚上，在一间被炮火掀掉屋顶的房间里歇息，我和营官们饿得不行，一个营官说：“看看有没有吃的。”我在屋里四周找都没有，在一角落，见几个坛子，其中一个坛子里面泡着盐蛋，但没有水，也只有做罢。大家就地躺下休息，但总闻到屋子有一股臭味，我到处找，终于在床下找到，有两具已经发臭可能是前几天被炮震死的尸骸。屋内没灯，分不清是男是女。当时正值云南盛夏，因不能及时收敛尸骸，有的已变绿，肚皮鼓起膨胀发亮。加之村里很多牲畜被炮炸死已高度腐烂变质，引来无数苍蝇，其味十分难闻。我们住的地方和经过之处，已是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跳蚤成千上万，每个战士身上都爬满了跳蚤，入夜更是蚊虫无数，叮得浑身奇痒无比，可见环境恶劣，条件之艰苦。

7月31日上午，2000多名老弱妇女及伤残病者集体出村，出村后有问题的被关起审查，其他的人被送到沙甸附近的鸡街铅厂、红水地砖厂等地办学习班。

8月1日至2日两昼夜，战斗在争夺金鸡寨、川方寨的民房和制高点进行。战斗时松时紧，但从未间断。8月2日中午，我身后发生爆炸，满天飞舞的石块砖头从天而降，我不幸被一块小石头砸中头部，当时鲜血直流，战友替我包扎后，忍着疼痛，不下火线，继续完成通讯联络任务。记得后来我还领了15元钱战伤费。8月2日下午，天空中出现了一架直升机，据说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亲临战区上空慰问鼓励参战官兵，并亲自指挥作战。听到这消息，我真的还兴奋了好几分钟。

8月3日，剩下最后的金鸡寨也被控制了大部份，短兵相接，争夺与拼杀更加激烈。晚上我们在金鸡寨的一片坡地上低姿匍匐前进时，遭到猛烈的袭击，火力十分强大。显然是外围部队所为，压得我们头也不敢抬，恨不得钻到地下。射击的时间持续很长，后来我索性朝天仰躺，开初我一直看着眼前头顶飞过的发亮的密集子弹，后来透过密集的子彈看天空，才发现天空闪烁的星星是那么美。望着这美丽的夜空，我似乎忘记了这是在战场，我的思想也伴着这美丽的夜色而进入了遐想之中……

8月4日下午，战斗已近尾声，近200名男女老幼及一些武装人员，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一部分走下坡地，到田埂时，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全线

突然开火，几分钟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我记得当时两报一刊的记者也在现场，其中一人说到：“这有些残忍。”这样就结束了七天八夜的沙甸战斗，战友面对这场胜利没有庆贺、没有欢呼，个个面无颜色，我想：大家此时此刻已经麻木了。

“兵者，凶器也。”是中国古代兵书上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用兵是件凶险的事”。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修昔底德感叹地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战争是凶暴的导师”。战争让人失去判断力与情绪之间的平衡，暴露人性的邪恶面，这就是战争带来的最大灾害，人再也不认识自己了。经历了几天几夜的生死拼杀，生命每天在狭窄地域游荡，在死亡线上挣扎。今天在一起的战友，明天或许就离开了，这是多么的惨痛，这就是生死战友情。和平时期，人的判断力和情绪是平衡的，人性的公正、善良和爱普遍可知的，更会得到制度的约束。但这些有理性、守纪律的人，在亲爱战友一个个离去后，在战争还在继续的背景下，心理和思想已发生严重扭曲，已由人性逐渐蜕变成野性、兽性。也由此变成了恶魔，这时人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其它则全属无稽。

美国学者在研究战争时发现，古今战争对参战者和被伤害者留下的心理和生理的伤害是永久的。战争创伤将跟随他们一生，战争对人的摧残不仅仅是肉体的，更重要的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会长时间存在并产生负面影响，对生活和社会及周围的一切产生悲观失望和仇视的扭曲心理特征。这应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沙甸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

所有参战部队死亡100多人，包括我团一名副团长。我所在的二营部死亡两人，一人是营卫生所的卫生员，一人是步谈机兵。由于我团伤亡过大，战后一支工程部队的近一千人补充到我团，记得当时二营部也分了6名补充兵员。沙甸战斗结束后，其它部队立即撤离了，126团却留在沙甸给回民建房子，时间长达半年。二营部就住在鸡街道班，建房造屋是体力活，劳动强度大，条件又艰苦，战士们真是苦不堪言。但也有高兴时，记得放工后，吃了晚饭，约上几位老乡战友，沿着鸡街至个旧公路散步，唱着一些知名的苏联歌曲，这算是苦中作乐吧。76年初部队返回驻地金平。

沙甸战斗结束后，有人统计：弹药的消耗量跟淮海战役有得一比，可以想象当时枪炮射击的激烈程度。后来有人说，沙甸战斗使用榴弹炮、火箭炮，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的事。使用最重的炮就是加农炮，由于威力巨大，记得没打几发就停止了。使用最多的就是迫击炮，当时使用了60、81、82、100、120毫米的迫击炮，还使用过40火箭筒，65式12.7毫米高射机枪及火焰喷射等常规武器。

沙甸事件的主要发起人马伯华，是个只有25岁的小伙子，带领回族武装反抗，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刻，最终死于炮火下，死时手也紧握驳壳枪。历史不好评说，对错难辩，我认为这要看写历史的立场与角度。

另一个沙甸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周兴，1925年参加革命，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7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据说，周兴在沙甸前线目睹部队和回民死了很多，立即下令停止加农炮的炮击，看到现场惨状，心中着急，自认为责任重大，当场就病倒不起，并于当年10月病逝于北京。

令人欣慰的是，1987年8月云南省委发了（1987）31号文件，至此“沙甸事件”得以彻底平反。

更值称道的是，在全国沙甸参战老兵不断上访和诉求下，2012年底中央承认沙甸参战老兵为参战人员，并于2013年1月起，农村的和城市下岗或无工作的也拿上了参战生活困难补贴。但对此事件不宣传、不报道、不公开。

在沙甸事件40周年到来之际，谨向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回族同胞致以深切的悼念，愿你们安息吧！

并祝愿有幸活着的战友幸福安康！

本文若有不妥之处，请知情战友指正。

126团二营部战士

2015年7月10日于四川成都

~~~~~

### 【史海钩沉】

毛泽东是如何找到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

• 大海之声 •

当毛泽东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本意是对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那么，他最终想达到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首先，必须彻底结束自七大以来党的核心层业已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20年来，曾经作为他的最佳搭档、他的忠实信徒、党内的二号人物、被他钦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已经笼络群臣，自成一体，开始和他分庭抗礼了。因此，在党的核心层彻底铲除刘少奇的势力，重新打造党内核心层内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为中心的政治平衡，已是当务之急。那么，用什么政治力量来填补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在党的核心层中留下的权力空白呢？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近年来越来越紧地追随着他的林彪，另一支是他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内发动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锐。其次，要对全国党、政、军内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党、政、军各级组织的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这些高层、中层、基层的领导干部的中坚，基本上仍然是从战争年代跟随毛泽东走过来的，他们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常规思维和长期养成的政治行为规范，是绝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些超常规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尤其不会赞成、理解、支持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的做法。因此，让这些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持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大权，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阻力，甚至使他毛泽东寸步难行。要想彻底改变这些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转而拥护他毛泽东的一切做法，是不可能的。但让他们在大规模的冲击中乖乖就范，不敢造次，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要对各级政府、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内大量掺“沙子”，把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政治积极分子送进各级政权组织，以改换成分，形成新的向心力，从而为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奠定牢靠的政权基础，这也是重中之重。第三，通过对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大规模的“洗脑”运动，构建一个高度集中、独一无二、定于一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标志为：1、将毛泽东本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理论方针打成一个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要在全党的精神活动空间和社会实践空间永远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且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被颠覆。2、建立一支在政治信仰上永远忠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路线的干部队伍。3、在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



域打造一支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从精神活动到政治立场都完全听命于中共、听命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理论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对于这个多年的梦想，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真的能实现，但他仍然坚持要去做。

既然第三个目标不可能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达到，那么前两个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呢？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势，他相信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在这个巨大的权力“洗牌”工程中，有许多难以想像的障碍，其中有些障碍是根本无法逾越的。最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直接的对立面——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这个被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党内核心群体远不只是一种觊觎权力的政治势力，它代表着 1、中共建国以来党内常规工作与正常思维的规范、准则和心理习惯力量；2、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在常规社会工作中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构成；3、纠正“三面红旗”的重大失误、牵引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困难、纳入正常运行轨道的“思想路线”；4、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正常欲望、以及广大民众数千年来避乱求稳的心理积淀。而毛泽东与之对立的“抗击轴心”所代表的社会历史因素，除了“君权至上”、“愚忠”狂热以及“暴民政治”尚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超常规的、虚妄的、脱离社会政治实际的、缺乏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基础的主观愿望或荒唐梦想。因此，两者较量的必然结局是：1、你可以打倒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或使整个群体暂时屈服，但不可能打倒他们的全部，不可能使他们永远屈服；2、你根本无法扭转这个群体的政治利益的总体构成，你必须向这种利益构成作相应的让步；3、政治暴力根本无法摧毁这个群体所代表的社会习惯力量和社会生活的常规，你必须在否定的同时不断作出肯定；4、无论“革命”如何轰轰烈烈，它都无法烧掉全体社会成员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强烈诉求。惟有对这种诉求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社会才不至于全面崩溃。而这种诉求会不断在政权的核心层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你如果不想自我毁灭，就必须为他们留出一定的席位。5、这个群落所代表的历史力量，其内在的逻辑对其对立面——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依据——所形成的颠覆作用，是深远的，强大的，不可遏止的。

关于上述种种障碍，毛泽东有想到的，也有没想到的。但至少有一点他做得是非常聪明和到位的，那就是找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他和自己的对立面之间进行巧妙的斡旋、协调乃至妥协。这说明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他的对手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彻底铲除，根本不可能，生死搏斗中难免要作妥协和让步。而这个重量级人物的最好人选，就是胸无野心、德高望重、心思机巧、八面玲珑的周恩来。

另外，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大规模的权力博弈中，还有许多根本不能预知的未知因素。比如，在填补中央核心层中刘少奇势力留下的权力空白的新生政治力量中，是否有能够承担起党内“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重任的“压轴人选”？要知道，刘少奇之所以能“压轴”，是通过他在党内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政治威望所实现的，他必须具备统摄全盘工作、并使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党员干部由衷信服的资历和帅才，他的威望和亲和力必须超然于党内的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之上，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依仗的新生力量恰恰就是从党内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中发达的，很难说能在他们中间找到这样的人选。再比如，在对付刘少奇的“司令部”的过程中，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多支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回避在这些政治力量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参与党内核心权力、包括党内最高权力的再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过程，谁能保证不会节外生枝、变生肘腋？下面我们不妨从十年文革中近十个回合的政治较量中，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中国数千年皇权时代“宫廷”政治斗争的精髓和营养，在波澜起伏的权力纷争以及在和障碍物反复的碰撞、反弹中时而驾驭自如，胸有成竹，处变不惊，时而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

第一个回合——设下陷阱，攻占“桥头堡”。上面已经说过，要想借四清运动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集团”发难，毛泽东已无处下手。第一，刘少奇等人在运动中的“错误”一经他批评，便立即检讨改正，随后对他步步紧跟；第二，整个运动的实际操作都在他们手里，并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图有条不紊地进行，毛泽东无可挑剔，无法扭转；第三，没有发现刘少奇等人有任何背着他的“非组织行为”或“阴谋活动”，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既如此，毛泽东只得另辟蹊径，另找借口了。在这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必须能通到刘氏“一线领导集团”的“腹地”，以攻破他们的防线，深入他们的核心，以便一击“毙命”。从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开始，毛泽东就着手重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火，作为他打造“主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能不能从这条战线寻找突破口呢？对毛泽东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思想文化、学术艺术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涉及的主要是中宣部和文化部，很难和刘氏“一线领导”挂上钩，同时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的批判也很难和七千人大会前后刮起的“三风”联系起来。惟一的“炮弹”，就是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了。但上面已经说过，其一，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本人的号召下，经人劝说写的；其二，《海瑞罢官》的剧本和演出，毛泽东本人都赞赏和鼓励过；其三，《海瑞罢官》的创作，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之前进行的，事实上和庐山会议沾不上边。可见，如果把《海瑞罢官》和1962年的“三风”、尤其是其中的“翻案风”联系起来，实在有些荒唐，也实在有悖事实，有违良知。因此，当江青兴致勃勃把这颗她亲手制造的炮弹向毛泽东推荐时，毛泽东一开始是犹豫的，举棋不定的。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批判《海瑞罢官》，是惟一一颗能够炸开突破口、并引领己方攻击力量深入敌人“腹地”的炸弹。但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引爆这颗炸弹，却是颇有讲究的。毛泽东深知，如果他公开支持这篇批判文章的出笼，刘氏“一线领导集团”很可能马上会表态紧跟，违心地附和他，迎合他，甚至像四清运动一样成为批判运动的实际操作者，到头来他依然是空忙一场，为他人作了嫁衣。因此，这颗炸弹的引爆，必须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如何设置这个陷阱？“幕后操纵，易地炮制，秘而不宣，突然袭击”，就是设置陷阱的成功策略。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姚文元文章的炮制为什么保密达七八个月之久？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为什么仍然躲在幕后一步一步引蛇出洞？现在看来，恐怕有如下几种考虑。1、从建国初期起，毛泽东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一次一次批判运动就从来没有得到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们的真正理解和真心拥护，几乎都是被动地、被迫地、违心地亦步亦趋地跟进。这些同僚当然包括当今刘氏“一线领导成员”的几乎所有成员。而姚氏的批判文章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起钩来，只要他毛泽东不公开出面支持，就必然引起“一线领导成员”的反对，这已是预料中的事。江青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李慧娘》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连连碰壁，就是明证。而只要他们反对，就不愁找不到整人的借口。2、《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批《海瑞罢官》，就等于批北京副市长，这必然惊动北京市委。而彭真一手操持下的北京市委早已是“刘氏一线领导”们开展工作的“桥头堡”。只要北京市委出面保吴晗，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就难免“犯错误”，就不愁找不到攻破这个桥头堡的突破口。3、早在1964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的头就是彭真。而彭真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而且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通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姚氏批判文章一出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必然要表态，而彭真如何表态，必然要请示邓小平、刘少奇和在京中央常委。只要“刘氏一线领导成员”对姚氏批判文章作具体表态，就不难找到向其“腹地”进攻的路径和炮弹。可见，如果毛泽东事前真是如此缜密地设置陷阱的话，那么事态的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计一步步进行的。

1965年8月，毛泽东审定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出所料，反应异常冷落。《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七省区报纸转载该文，还是事先有人打了招呼。而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报纸和新华社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在18天内都没有转载。但这篇文章显然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

因《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他不同意该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吴晗本人当然不服，他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那里得到了同情、理解和支持。而反应最强烈地当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他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而这些反应正好为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提供了口实：“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反应当然是震怒。然而，这也正中他引蛇出洞的下怀。他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其实真的要把这把火点向全国很容易，毛泽东此刻公开支持姚文就是了。但毛泽东不，他还要钓出更大的鱼，他还要继续在幕后遥控。果然，北京对这个单行本根本不买账。彭真恼火地说：一本也不订！刘仁则把上海新华书店的征订单撕了个粉碎，声言连电报也不回。直到11月27日周恩来由上海回北京，才向彭真打招呼，毛泽东指示北京各报要刊登姚文。而此时彭真等人的抵触情绪丝毫不减。11月29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并加了按语。《解放军报》抢先于同一天刊出姚文，并在编者按中公开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和《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唱反调。就是说，尽管彭真等人已经知道姚文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在北京的报纸上仍然想竭力挽回局势，否认《海瑞罢官》和现实政治的联系，把争论扭转到学术讨论的领域来。《人民日报》的按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围绕姚文的大争论。当12月6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的情况、《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忍无可忍的彭真果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表态，支持彭真关于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不能毫无根据就给吴晗乱下结论的意见。接着两人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感到迷惘，他不知毛泽东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这个党内的二把手通气，但他表示赞成彭真、邓小平的意见。这一切，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开始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亲自动笔修改审定姚文、以及姚文整个出笼过程都在他一手操纵之下的内幕仍没有披露。他要进一步试探在京常委们的态度。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5人，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态度鲜明地把此文和彭德怀挂起钩来。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见彭真时，彭真据理力争，竭力为吴晗开脱，坚持《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翻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姚文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径极为不满，引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感。他是否认为彭真的强硬态度有后台支撑，不得而知。但彭真的态度使他深感事态严重，他的话，确实有人不听了，而且开始公然和他分庭抗礼。12月26日，彭真随毛泽东来上海，和张春桥就姚文一事发生公开冲突。而在毛泽东72岁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到自己身旁，公开赞赏他组织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表明对张春桥的支持。然而，从12月底到次年2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出台前后，毛泽东尽管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他的基调并非张扬，而是隐忍，一方面让文化界和学术界更多的“学术权威”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暴露出真实面目，一方面等待“一线”的中央常委们最后摊牌，以寻求最佳战机。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召集五人小组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和康生发生争执。会后，彭真不顾康生反对，让人连夜突击，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彭真的意见，康生没有表示公开反对。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在向彭真核实吴晗确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后，和邓小平一起赞同《提纲》观点，并通过了提纲，准备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彭真率领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的态度耐人寻味。他对提纲不置

可否，没有表示任何赞同或反对的意见。但是，在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放出的几个试探性的气球，却是大有深意的。第一，他像刘少奇一样提出：《海瑞罢官》的问题是不是和彭德怀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他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是，他把这两者联系的发明权推给了康生。第三，在对吴晗的组织处理上，毛泽东明确表态可以不罢他的官。并指出“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可见，避开对《二月提纲》的正面表态，一方面从侧面表明自己的立场，似乎自己此刻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组织处理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表示某种宽容，从而使对手产生可以“得寸进尺”的错觉，这正是毛泽东诱使对手犯更大错误的策略。

果然，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将提纲发到全党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立即行动起来，于2月11日就在武汉组织人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就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二月提纲》作为中央精神发到全党，对挫败“左派”的批判锋芒，扭转整个批判运动的方向，将讨论拉回到学术领域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切迹象表明，这很快就要成为眼前的事实。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找到了突破口，开始反击。突破口并非起缘于“罢官”事件本身，而是有关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两件事。一件，是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派不派代表团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在京常委会议通过讨论倾向于参加。另一件，日共代表团来京访问。两党在联合公报的起草中就是否公开点苏共的名的问题产生分歧。在京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照顾日共的困难，最好在联合公报中不公开点苏共的名，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这两件事，中央决定由康生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孰料毛泽东均不同意在京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在派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批评道：“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针对同日共会谈的公报草稿，毛泽东批评：“……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也正是在这次康生的汇报中，毛泽东借机对《二月提纲》发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反击，而且志在必得，一举摧毁中央“一线领导”的“桥头堡”——由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看，当康生在汇报中借机提到《二月提纲》时，毛泽东严厉地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两天以后，即3月30日，毛泽东主动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把投向“桥头堡”的重型炸弹放了出去：“……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现有的官方资料都普遍倾向于为毛泽东遮羞，似乎在这次汇报中因毛泽东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唆和蒙蔽，才犯了糊涂，铸下大错。如此说来，毛泽东是被权臣玩于股掌之中的昏君了。这种愚蠢之极的昏话出于历史学家们之口，真是中国文人的奇耻大辱。毛泽东是驾驭群臣的高手，并且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栽倒在他精心设下的陷阱的“权臣”们不知凡几，而他每次都能胜出。这足以说明，他虽不像朱元璋那样明火执仗地诛杀大臣，但其心机、谋略、残忍、无情绝不亚于朱元璋。“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才是插进和他合作多年的臣僚们心脏的三把刀子。就这三个“解散”，不知有多少臣属要蒙冤打入冷宫，不知有多少家庭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这三把刀子真的是毛泽东被人挑唆而一怒之下随手抛出的吗？真要这样想，不是有意撒谎，就是太天真了。三把刀子中的每一把，毛泽东都是精心打造，蓄谋已久，什么时候抛出才能一击毙命，他也是老

谋深算，捕捉时机。《二月提纲》初次向他汇报，他不置可否，含糊其词，不予表态。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把《二月提纲》弄成了，经中央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下发了，他却突然袭击，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还为当初不表态找了一个借口：“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以上资料均摘自《尘封岁月》第21页至46页）找这样拙劣的借口，真是天大的笑话。其一，这个草案本来就是在京常委讨论同意的；其二，汇报期间，彭真反复为吴晗、邓拓辩护，陆定一也极力附和彭真，难道毛泽东还看不出《二月提纲》草稿是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其三，毛泽东当真是对“常委意见”听之任之、或曲意服从的人？非也，恰恰相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对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只要违背毛泽东的意愿，他不仅不买账，还非要扳过来不可。尤其是在他所认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寸土必争，绝不让步。四清运动中制定《二十三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纠正”刘少奇等人的“错误”意见，结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拉回人员重开，已经经中央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下发的中央文件《十七条》可以停发、收回、推倒重来，难道《二月提纲》所犯的足以导致“三个解散”的严重错误，就因为“常委讨论”通过了就会被毛泽东容忍，并听之任之地由其下发全党？

所谓解散机构，那是假的，换人夺权，才是真的。北京市委、五人领导小组、中宣部，都是“一线领导”们的屏障，但主要屏障，却是京畿要害的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作为掌管首都党政大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仅是中央一线工作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而且是影响中央核心权力变数的重要因素之一。更要命的是北京市委的第一“掌权大臣”恰恰是七千人大会上就斗胆直言毛泽东错误、继而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又和毛泽东死扛的彭真！拿下北京市委，粉碎北京市委的全班人马，扫清下一步进攻的障碍，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一步关键杀着！

毛泽东的全面反击，就此开始。在由邓小平主持的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彭真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得不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又声明他不会反对毛主席。这已经晚了。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吴晗是冤枉的？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不牺牲吴晗，突破口又何以打开？心腹之患又何以根除？含冤受屈的吴晗尚且值得牺牲，何况他敢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的彭真！

既然《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当然要像四清运动中的《十七条》那样取消、收回了。为此，王力奉命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正是在这个通知的起草问题上，刘、邓又疏忽了一步。通知极其简单，只通知《二月提纲》予以撤销，既不提提纲的错误所在，又不提撤销的原因。显然这是极其勉强的应付，甚至是一种极不情愿的软抵抗。毛泽东当然不满意。毛泽东的本意恰恰相反，他要借《通知》的起草再做一篇更大的文章，这篇文章燃起的战火要直接烧到刘、邓二人头上。请看，王力的第一稿《通知》被毛泽东以“没触及实质问题”否定后，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通知》第二稿，康生还特意加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满意。毛泽东再次提议，成立《通知》起草小组，由陈伯达当组长，到上海起草《通知》。这一次，陈伯达手下的小组成员有10名，而且起草小组起草的每一段文字，都必须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杭州给毛泽东过目、修改。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准备《通知》，另一方面争分夺秒地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并借此扩大战果，向“纵深”进攻。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新华社未经请示播发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认为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安然过关。毛泽东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和按语。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但此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原班人马能否“改弦易辙”，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他的目标是彻底改组北京市委，正愁找不到借口整垮北京市委原班人马。因此，当北京市委于4月24日至26日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会议却被定性为庇护彭真的“四月黑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判彭真。为了借批彭真而把火烧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头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来：“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毛泽东说出这番话，已表明了他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远远不是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而是要把战火烧到中央的更高层次，烧到全国了。五月上旬，经过精心策划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识别真伪》、《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等“左派”文章相继出笼，这是毛泽东发动更大规模进攻前的“炮击”，至此，身受重创的北京市委已形同瘫痪，彭真这个“屏障”已被搬掉，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直接暴露在毛泽东的炮火之下。6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改组，这个“绊脚石”终于搬掉。至于新北京市委听谁的话，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